

南京城市贫困空间调查与分析

陈 果¹, 顾朝林¹, 吴缚龙²

(1.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2.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地理系)

摘要:从城市社会地理学的角度,运用城市社会保障资料和典型社区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南京市城市贫困阶层进行了空间分析,并探讨了产生这一格局的原因和机制。从南京的实例不难看出,中国当代的城市贫困空间,既不同于国外城市的棚户区 and 边缘化特点,也不同于中国农村贫困户相对集中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分散性特征。形成这种城市贫困空间结构的动力机制主要在于中国城市近50年的城市住房分配制度造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阶层混合居住的局面。随着城市住房体制改革的逐步完成和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进程,中国城市的贫困空间也将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趋势,即贫困家庭向地价低廉的城郊结合带集中,而在城市中心区的外围也将由于房地产开发无法获利而造成旧区的衰退,从而形成贫民区。

关键词:城市贫困;城市社会空间;南京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90(2004)05-0542-08

中国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和经济结构均处在重构之中,尤其大城市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城市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由于种种原因而生活水平下降,处于贫困状态。城市贫困阶层是一定社会经济发展时期的特殊产物,它的产生以及空间过程与城市经济结构、城市居住空间结构和城市地理环境等相关。本文从城市社会地理学的角度,运用城市社会保障资料和典型社区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南京市城市贫困阶层进行空间分析,试图对中国当代城市的贫困空间分布进行初步探讨。

1 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

城市的空间研究是城市地理学的传统领域^[1,2]。城市社会空间主要是城市社会学、城市地理学、空间经济学和人类生态学共同的传统研究范畴。城市贫困空间作为城市社会空间的一部分,一直得到地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重视。

20世纪20~30年代,芝加哥社会学派以社会生态学方法对城市贫困空间分布进行了研究。后来,伯吉斯提出的同心圆理论(Concentric Zone Model)解释了城市下层阶级的居住空间^[3],霍伊特^[4]的扇形模式(Sectoral Model)说明美国城市低

级住宅区不完全呈同心圆状分布现象,美国地理学家哈里斯和乌尔曼^[5]的多核心模式(Multiple Nuclei Model)则解释城市低级住宅区可能围绕中心商业区,重工业区等呈多核心分布。

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马克思主义结构学派抨击新古典主义的城市空间结构分析方法,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观点来分析城市空间发展规律。人文地理学家和建筑学家也随之用“场所”代替传统“空间”概念,将人们创造的社会文化价值和人们对城市空间环境的体验和需求引入到空间概念之中,这也标志着城市空间研究从以物质形态为主向以社会主体人为主的转变^[6]。随着社会民主化和市民化进程的演进,城市空间研究的社会化倾向愈益明显,公共空间成为城市规划者和城市研究关注的焦点,城市空间环境的“路径依赖”也开始研究^[7]。马丘比丘宪章(1977)提出将空间规划、社会规划和经济规划结合为一体的设想。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开始对经典的三个城市地理模型提出质疑^[8]。舒尔茨(Rob Shields)“空间化实践(the practice of spatialization)”及边界、门户、重心和分化四大策略^[9],卡斯蒂尔(Manuel Castells)的流动空间定义^[10]都对

收稿日期:2003-09-16; 修订日期:2003-12-11

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基金(40025102)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9871031)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陈 果(1976-),女,江苏南京人,主要从事城市地理研究,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地理系博士生。E-mail: gucl2002@

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作出的重要贡献。最近, 米歇尔又将空间、场所和信息城市的发展连接起来^[11]。概括起来, 西方学者对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理论和学派主要有生态学派、新韦伯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古典主义学派、空间分析学派、后现代主义学派、行为学派和人文主义方法等^[12]。

国内关于城市社会空间研究起步较晚^[13], 王均等在 1999 年对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城市社会空间进行了研究^[14], 吴文涛从人口分布的角度对近代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特征进行研究。王兴中^[15]《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一书结合西安实证进行研究。最近, 随着城市社会的变迁, “不同阶层的人口, 开始有规律地居住在城市的不同区位, 其中包括城市贫困人口逐渐聚集在城市的某些特定区域”, 形成城市贫困空间, 即新“城市贫民区”, 城市贫困空间也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16,17]。

2 城市贫困空间分析方法

在社会学研究中, 往往通过 ①居民的收入、住房等社会经济指标, 或 ②接受社会福利的贫困者等统计资料, 利用均值、方差、标准差、变异系数、峰值、偏离度等统计量, 描绘贫困阶层的空间特征及分布类型。在社会地理学研究中, 下述两种研究方法与城市贫困空间分布研究密切相关。

2.1 生活质量综合衡量方法

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研究为研究城市社会空间差异提供了数量分析的可能性。关于生活质量的指标建立有不同的方法。史密斯^[18]选取了 6 个指标: ①社会福利依赖性, ②空气污染程度, ③娱乐设施水平, ④吸毒案例, ⑤家庭稳定程度, ⑥地方的参政意识, 通过对各个统计区域内的指标值标准化, 进行加权综合, 得出各社区的生活质量分异。诺克斯^[19]在其研究中, 选取了 11 类共 50 个变量进行综合分析。这些变量反映了生活水平的各个方面, 包括健康状况、住房水平、就业机会、教育程度、个人信誉、收入与消费水平、娱乐、社会与政治参与、生活适宜程度、环境质量和社会稳定等。

2.2 社会剥夺研究方法

社会剥夺(Social Deprivation)是对贫困的一种

相对性的理解, 可以反映贫困者及其他弱势群体的贫困程度。对社会剥夺程度的空间分析, 一般采用多指标的综合评分方法。例如在各统计单元内, 选取住房适宜度、居住面积、空置住房、子女数、低收入者、失业人员、残疾人、重病患者、单亲家庭、家庭人口数等统计指标, 进行统计分析, 计算各单元的综合得分, 划分其社会剥夺的等级^[20]。

城市贫困空间的分析需要小区域(如统计单元)的人口和社会统计数据。这种要求常常不能在发展中国家获得满足。因此, 对贫困社区的典型调查也是一种重要方法。

3 南京市贫困空间调查

为了研究南京市城市贫困空间, 笔者曾于 2001 年 2~4 月期间, 走访了南京市民政局、统计局等有关部门获得城市分街道最低保障人数, 依据他们占总人口的比重分配分区抽样调查数, 对典型居住地区进行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

3.1 调查方法

在本次调查之前, 没有任何部门或学术研究机构对南京市城市贫困阶层的规模和贫困程度及其分布进行专门的研究。因此, 该调查参照国内外学术界对贫困阶层的界定标准, 结合南京市民政局的统计资料以及国家统计局每年在各城市中“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 进行南京贫困阶层规模的初步估算。

根据南京市民政局的统计资料, 2000 年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约为 1.8 万人, 占全市非农人口比例的 0.57%。据南京市有关部门估计, 这部分人口仅占城市中实际生活水平相对贫困人口的一部分。我们根据南京市接受社会保障人员的分布差异, 在鼓楼、玄武、白下、秦淮、建邺和下关六城区范围内, 按适当比例选择了 11 个典型社区, 对这些社区内的贫困家庭进行调查(表 1)。

本次调查, 采用类似“滚雪球”^①的调查方法, 访问 78 户家庭, 共 230 人。调查问卷具体分三个部分: (1) 家庭成员基本状况调查; (2) 家庭社会和经济状况调查; (3) 针对贫困的具体问题调查,

① “滚雪球抽样”(Snow ball Sampling)是一种非概率抽样技术, 常用于定性的实地调查中。在无法进行大规模社会调查, 或难以找到对象总体的成员时, 可以先搜集少数群体的资料, 再根据他们的建议, 找到其他的成员。这种方法尤其适用于对无家可归者、流动劳工、移民的样本调查。见 1999 下岗职工再就业现状调查报告(节选), 中国经济时报, 2000 年, 10 月 23 日。棚户用房芦苇、油毡或铁皮搭盖, 上无梁柱, 下无基础、室内阴暗潮湿, 极易倒塌。

表 1 南京市城市贫困调查典型社区抽样分布表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sampling communities in Nanjing

区	街 道	最低保 障人数	贫困 程度	抽样社区(居委 会)名	抽样数
玄武区	梅 园	195	IV	汉府街	10 户
	锁金村	171	II	锁金六村	7 户
秦淮区	钓鱼台	196	III	荷花塘、高岗里	8 户
	中华门	272	V	西街、下码头	14 户
建邺区	安品街	278	IV	评事街	10 户
下关区	中山桥	241	IV	宝善街、南通路	22 户
	建宁路	156	II	五所村	7 户

注: 贫困程度计算方法见后文阐述。

如是否失业、下岗或退休、无业人员, 是否领取社会保障等。调查数据被逐项填入调查表。同时, 我们还对部分被调查的贫困家庭所在的社委会和居委会的负责人以及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居民进行了深入的无结构式访谈。调查地点和抽样数如图 1 所示。



图 1 南京市城市贫困社会调查地点及抽样数示意图

Fig. 1 Location of surveyed communities and sample sizes

表 2 南京市工业从业人员变动

Table 2 Employment change of manufacturing in Nanjing(1996-1999)

	1985	1996			1999		
		制造业	采掘业	电力煤气水生产和供应业	制造业	采掘业	电力煤气水生产和供应业
从业人员百分比(%)	36.6	33.0	0.3	0.8	26.4	0.3	0.7
职工人数百分比(%)	69.0	45.7	0.7	1.6	38.8	0.7	1.7

资料来源: (1) 南京市统计局编制, 南京统计年鉴 1985; (2) 南京市统计局编制, 南京统计年鉴 1997; (3) 南京市统计局编制, 南京统计年鉴 2000。

数的 13.4%, 他们下岗再就业时 88.5% 转向第三产业, 9.6% 继续从事加工制造业; 受雇就业者占 51.3%, 自营就业(或自谋职业)者占 48.7%; 受雇者具有相对稳定劳动关系的仅占 6.8%, 其余大部分从事临时工、劳务工、季节工、小时工等非正规就业形式^①, 绝大部分均在低收入行业工作。

3.2 分析结果

城市贫困一般被认为是收入低所造成。南京抽样调查资料表明, 城市贫困主要由于产业重构与下岗失业、在业低收入和社会保障制度滞后。

1) 产业重构与下岗失业。1990 年代以来, 南京第三产业内部结构趋向多样化和新型化, 为生产服务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综合科研技术等部门发展迅速。传统产业部门农业的现代化步伐也在不断加快。这一时期,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向高层次转化, 总趋势表现为: 第一产业增长趋缓, 第二产业保持高速增长, 第三产业则迅速发展, 尤其反映在第二产业部门比重下降和结构重构。如表 2 所示, 南京市近 20 年来工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呈下降趋势, 其中, 尤以制造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下降速度最快。南京的调查说明: 产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失业和下岗, 1997~2002 年 8 月, 全市累计下岗人员达 24.61 万人。

2) 在业低收入。首先, 南京调查表明城市贫困与相关行业低工资有关。如表 3 所示, 从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看, 从南京 1994~1999 年的数据看, 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商业餐饮业、社会服务业等行业的工资低于所有行业平均水平, 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商业餐饮业等行业的工资低于所有行业平均增长率(表 3)。

图 2 显示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主要集中于低收入行业。其次, 根据南京下岗再就业人员的调查, 属于“有工作岗位的穷困家庭”大约占调查总

3)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主要表现在: 一是社会保障覆盖面窄, 保障项目不完善, 体系不健全, 很难使贫困家庭均等受益; 二是基金筹措渠道来源不够合理, 特别是贫困情况严重的地区, 往往财政情况比较困难, 采用国家、地方固定

① 见'99 下岗职工再就业现状调查报告(节选), 中国经济时报, 2000 年, 10 月 23 日。

表 3 南京市分行业职工收入变动表(1994~1999)

Table 3 Sectoral income changes in Nanjing, 1994-1999

项目	1994 年	1999 年	增长(%)	低于所有行业平均水平	低于所有行业平均增长率
所有行业平均	5865	10295	176		
采掘业	4815	7394	154	*	#
制造业	5243	8621	164	*	#
水电煤气生产供应	9121	16432	180		
建筑业	6430	9966	155	*	#
地质勘察、水利	6463	9302	144	*	#
交通、仓储、邮电	7144	13534	189		
商业、餐饮业	5354	8894	166	*	#
金融、保险业	9546	18148	190		
房地产业	7438	14023	189		
社会服务业	5645	11717	208	*	
卫生、体育、福利	6159	11754	191		
文教、艺术、影视	6388	11371	178		
科研技术服务	7904	14701	186		
党政、机关、社团	7113	14583	205		

资料来源:南京市统计局编制,南京统计年鉴 1995;南京市统计局编制,南京统计年鉴 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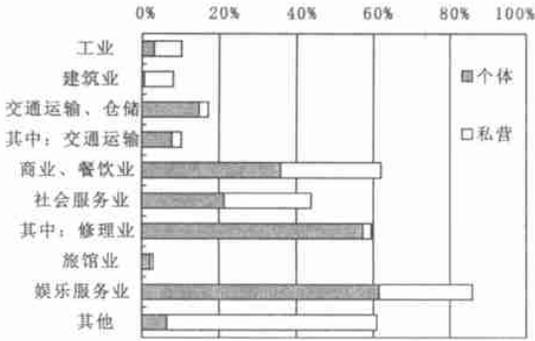


图 2 南京市私营个体从业人员结构(1999 年)

Fig. 2 Occupation structure of employment in private and individual economies of Nanjing, 1999

比例分摊扶贫款项的做法有待完善; 三是社会救济和困难补助标准太低, 失去了保障的意义和本应发挥的作用。1980 年代以来, 南京城市救济人数逐年减少, 已经由 1980 年的 30 000 余人次下降为 1989 年的 1 500 人次, 但 1996~2000 年南京市接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口却逐年上升, 其中无业人员、失业和下岗人员的人数增长特别显著。因此, 不难看出, 原有城市社会救济制度已不能城市社会的变化, 使部分弱势群体很容易陷入贫困境遇(图 3, 4)。

根据南京市家庭调查, 城市贫困的致贫因素主要是下岗、无业、“农转非”和残疾者(表 4)。

4 南京贫困空间分析

4.1 历史上的贫困空间

南京为民国时期的首都, 1949 年解放时 20 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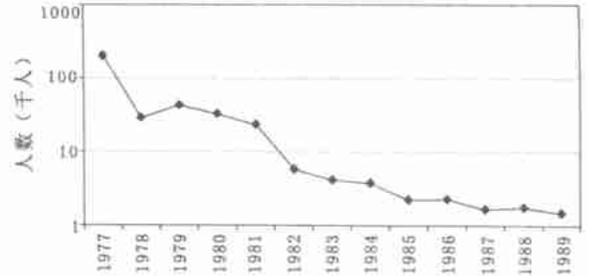


图 3 南京市社会救济人次变动(1977~1989 年)

Fig. 3 Change of social allowance or subsidy recipient in Nanj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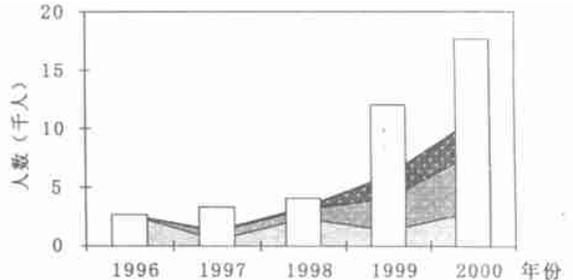


图 4 南京市社会保障人数及构成变动(1996~2000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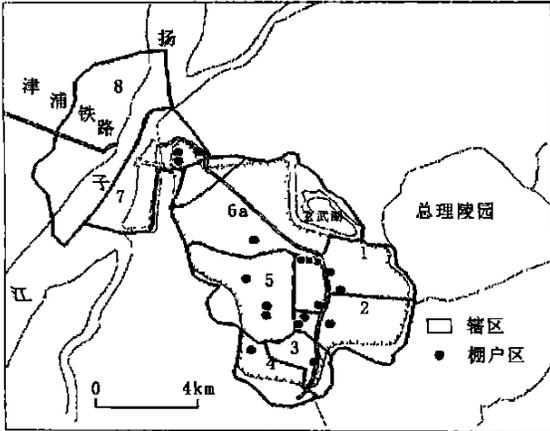
Fig. 4 change and compisition of social assistance recipient in Nanjing, 1996-2000

万的城市贫民主要栖居在玄武区的演武厅、虹板桥、晒布厂、沙塘园、汉府新村, 白下区的五老村、广艺街、龙王庙, 秦淮区的双乐园、建邺区的宫后山、冶山道院, 鼓楼区的上海路、牌楼巷、驴子巷, 下关区的小桃园、五所村等地的棚户区内(图 5)。

表 4 南京市贫困家庭致贫因素统计分析

Table 4 Causes of urban household poverty in Nanjing

致贫因素	家庭人均收入(元)		人均居住面积(m ²)		个案数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数量	%	
“农转非”	188.7	80.2	7.5	3.7	13	10.0	
残疾者	213.7	110.4	10.9	6.7	13	10.0	
重病患者	224.1	63.8	13.1	5.8	12	9.1	
下岗	下岗者	261.3	228.3	10.4	6.2	51	38.9
	双下岗	237.1	66.5	13.2	7.1		
提前退休者	686.7	494.2	15.5	7.8	5	4.9	
长期无业者	218.3	91.6	13.0	9.0	37	27.1	



(根据 1937 年区划范围图、1948 年南京市街道详图绘制)

图 5 1949 年前南京市棚户区分布

Fig. 5 Location of Slums in Nanjing before 1949

据统计,旧南京全城有 309 处棚户^①区(表 5),占地约 $83 \times 10^4 \text{ m}^2$,平均每户建筑面积只有 $10.5 \sim 12 \text{ m}^2$,建筑密度却达 60%。如表 5 所示,解放前南京市贫民住房主要分布在城南、下关和城中(现鼓楼、玄武区南部)地区。

表 5 解放前南京市贫民住宅类型及其空间分布(1948)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or and housing conditions in 1948

辖区号	地区	公寓	里弄房屋	一般住宅	棚户		
					(户)	%	
1	城中	280 幢	422 间	64300 间	3240	17.0	
2	城南	829 幢	3860 间	75600 间	5600	29.4	
3	城南						
4		36 幢	6000 幢	335	1.8		
5	城中	600 户	3379 户	16553 户	4304	22.6	
6	6a	城北	400 户	632 间	8388 户	565	3.0
	6b	城北		65 间	2356 间	486	2.5
7	下关区		200 间	23200 间	4522	23.7	

资料来源:南京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南京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志》,1980。

① 棚户用房用芦苇、油毡或铁皮搭盖,上无梁柱,下无基础、室内阴暗潮湿,极易倒塌。

4.2 改革前的贫困空间

南京市棚户区的改造始于 1950 年代,首先从一些居住条件极差的地区开始,白下区的五老村率先拆除棚屋,建造了一批砖木结构平房。直至 1980 年代初,在大规模的旧城成片改造过程中,南京的棚户区才逐渐消失。然而,从居住空间和住房质量看,南京的城南和城西的部分地区以及一些传统民居和街道,仍然是城市低标准住宅的集中分布区,也是“老南京人”、回城知青、制造业工人住宅和城市边缘地带“农转非”家庭等城市低收入或贫困家庭的居住地带(图 6)。

4.3 形成中的新贫困空间

南京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统计资料显示(表 6),南京 6 个城区中仍然以城南的秦淮区与建邺区以及城北下关区占比例最高,鼓楼区和玄武区比例最低。

从 47 个街道看,我们根据各街道的统计数值 P ,计算得出均值 p 与偏差 σ ,在此基础上将这些街道划分为五类,分别是:I 类,低于均值即 $P < p - \sigma$; II 类,略低于均值, $P \in (p - \sigma, p)$; III 类,略高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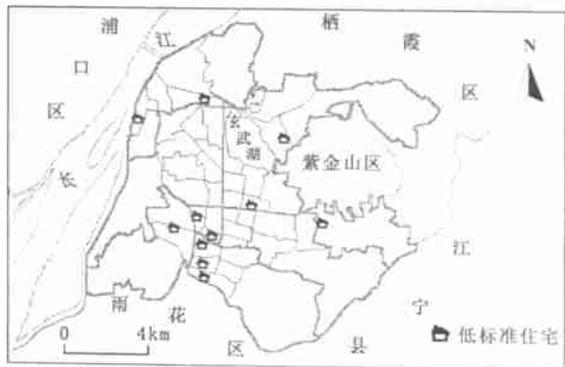


图 6 改革前南京城市低标准住宅分布示意图

Fig. 6 Distribution of low-standard housing in Nanjing before economic reform

表 6 南京城市贫困阶层的分区差异

Table 6 Percentages of urban poor in subdistricts of Nanjing

城区名称	社会保障户数(户)	占总户数的比例(‰)	社会保障人数(人)	占城市人口比例(‰)
玄武区	624	5.07	1231	3.18
白下区	669	6.40	1327	4.27
秦淮区	708	8.01	1397	6.24
建邺区	671	7.56	1335	5.69
鼓楼区	652	4.43	1346	2.60
下关区	709	7.31	1407	5.09

均值, $P \in (p, p + \sigma)$; IV类, 较高, $P \in (p + \sigma, p + 2\sigma)$; V类, 很高, $P > p + 2\sigma$ 。由表 7 可见, 玄武区的红山和秦淮区的中华门贫困人口比例最高, 建邺区的安品街和下关区的中山桥次之; 在社会保障户

表 7 南京城市贫困阶层的空间分布

Table 7 Classification of communities by poverty rate

类别	贫困程度	街道名称
I 类	$P < p - \sigma$	江东、水佐岗、兰园、后宰门、孝陵卫、淮海路、瑞金路
II 类	$P \in (p - \sigma, p)$	五台山、宁海路、湖南路、三牌楼、中央门、鼓楼、挹江门、新街口、丹凤、玄武门、玄武湖、锁金村、苜蓿园、洪武路、朝天宫、车站、建宁路
III 类	$P \in (p, p + \sigma)$	华侨路、健康路、石门坎、五老村、大光路、夫子庙、钓鱼台、双塘、秦虹、红花镇、饮虹园、止马营、莫愁湖、南湖、兴隆、热河南路、宝塔桥、小市
IV 类	$P \in (p + \sigma, p + 2\sigma)$	梅园、安品街、中山桥
V 类	$P > p + 2\sigma$	红山、中华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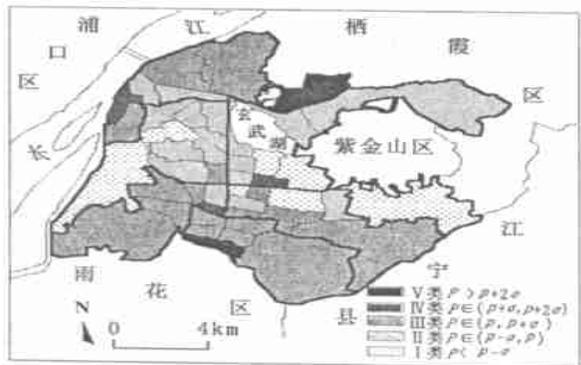


图 7 南京城市贫困空间分布示意图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verty in Nanj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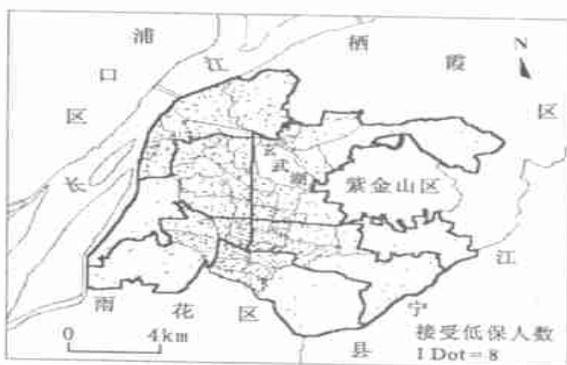


图 8 南京城市贫困人口分布

密度示意图(1点 = 8)

Fig. 8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or in Nanjing

占总户数的比例最低的玄武区, 其梅园贫困程度也列第二级(表 7, 图 7)。

我们以每点代表 8 人, 将南京市贫困家庭及人口编制成分布图(图 8), 可见南京城市贫困空间具有较明显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征。由于

本次调查未涉及流动人口, 事实上, 现在南京的河西和中华门外等城市边缘区, 已经成为外来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聚居区, 有的地方已经形成小片的新棚户区。

5 结 论

根据我们的资料整理和调查,不难看出,南京在1949年前、改革开放前和现在三个时期的贫困空间主要集中在城南、城中南部和城北的下关码头地区,但整体上表现与西方城市形成的贫困节结区正好相反,呈现为弥漫型面状扩张。南京城市贫困空间杂居在城市的各个区域,不论是中心区,还是商业区,都有贫困家庭的分布。这一点既不同于国外城市的棚户区边缘化特点,也不同于中国农村贫困户相对集中分布,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

我们认为形成这种城市贫困空间格局的动力机制主要在于:中国城市近50年的城市住房分配制度造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各阶层混居的特点。随着城市住房体制改革的逐步完成和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进程,中国城市的贫困空间也将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趋势,即贫困家庭首先向地价低廉的城郊结合带集中,然后在城市中心区的外围形成贫民区。

从南京贫困空间分析可以看出具有较好的历史延续性。这主要在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限于财力并没有对贫困户集中的旧城进行彻底的改造,而是集中力量建设以单位制为特征的新区,形成了各社会阶层混居的格局。传统意义上的贫困人口,虽然旧城区较多,但并无明显的集结,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三无”贫困户的发生率是无显著空间差异的,其数量与总人口数相关,一般在空间上曾均匀分布。新城市贫困,主要由于下岗、失业或低工资造成,与工商区的分布有关,但由于在城区层次上的统计单元太大,忽视了在局部地区的空间差异性。

参考文献:

- [1] 许学强. 城市地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 [2] 周一星. 城市地理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5.
- [3] Burgess Ernest. "Concentric Zone" model of urban structure and land use[M]. Landmark Publication, 1925.
- [4] Hoyt H. The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s in American Cities [R]. Washington D. C.: 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1939.
- [5] Harris C D. E L Ullman. The nature of cities [J].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45, 242, 7- 17.
- [6] Lynch K.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M].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60.
- [7] Lofland, Lyn H. A World of Strangers: Order and Action in Public Space[M]. Prospect Heights, Ill: Waveland Press, 1985.
- [8] Badock Blair. Unfairly Structured Cities[M]. Oxford: Blackwell, 1984.
- [9] Shields Rob. Places on the Margin: Alternative Geographies of Modernity[M]. London: Routledge, 1991.
- [10] Castells Manuel.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 I: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M]. Cambridge MA.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 [11] Mitchell, William J. City of Bits: Space, Place, and the Infobahn[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
- [12] 顾朝林. 城市社会学[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2.
- [13] 顾朝林, 胡秀红. 新时期中国城市发展新动向[J]. 城市问题, 1998, (3): 26- 28.
- [14] 王 均, 祝功武. 清末民初时期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的初步研究[J]. 地理学报, 1999, (1): 69- 76.
- [15] 王兴中.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
- [16] 顾朝林, 克斯特洛德. 转变中的北京城市社会空间结构[A]. 载许学强编. 中国乡村-城市转型与协调发展[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8. 31- 38.
- [17] 陈 涌. 城市贫困区位化趋势及其影响[J]. 城市问题, 2000, (6). 15- 17.
- [18] Smith D M. Spatial Variations in Welfare: An approach to Population Geography[J]. South African Geographer, 1973, (4): 187- 192.
- [19] Knox Paul, Steven Pinch. Urban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M].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0.
- [20] Haller B. Deprivation and Pover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weden and Great Britain[J]. Acta Sociologica, : 1996, (39): 141- 169.

Spatial Analysis of Urban Poverty in Nanjing

CHEN Guo, GU Chao-Lin, WU Fu-Long

(1. *Department of Urban and Resource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Southampton, UK*)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es on poverty under Chinese state socialism placed a disproportionate emphasis on rural areas. As a result of the soci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conomic reform, the urban social space in China has been undergoing a remarkable transform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in recent years. While some social groups become rich earlier, some others are losing their advantages in the social economic system. They are suffering deterioration in living qualities, and form the so-called "urban poor" or "new urban poverty" in transforming urban society. The presence, the living status, the social behavior,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ch a special group of people are play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space and urban landscapes in China. This article stresses the urban poverty under political transition a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This research aims to examin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verty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geography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n Nanjing City. The data used includes government records on social assistance recipients, as well as materials gathered from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s in poor communities. We argue that the "social equity" has disappeared since the economic reform and the ensuing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1984. The economic transition occurring in China is creating new sources of urban poverty populations, which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urban poor comprised of the "three nos" in the socialist era.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linkages between the transitional nature of state economy and the new urban poverty in mainland China.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causes and mechanism of urban pover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verty is both different from the "slum" aggregation in other third world countries, and different from the regionally concentrated rural poverty in China. We argue that the decentralized and stochastic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poverty in China is driven and precipitated by the state housing allocation policies during the past 50 years. It is suggested that with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housing reform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housing market, urban poverty will exhibit greater spatial concentration, with poor households moving toward the urban fringe areas and gradually forming poor communities outside the urban center. Based on the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 we propos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ddressing the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economy, current welfare system, and social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s to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new urban poverty in China. The changing composition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poverty population are discussed.

Key words: Urban poverty; urban social space; Nanjing